

文史资料选辑

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

希望过了100岁的委员都能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留下来，作为对社会的贡献……

戊戌以来是中国社会变动极大的时期，有关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方面记载下来……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史料很值得收集。时间过得很快，开国至今已经10年了，如果不抓紧，有些史料就收集不到了……现在当然首先要研究现实问题，反映新的情况，但对过去的东西也需要研究，新的东西总是从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……有些东西不赶快记载下来就会消失。从最落后的到最先进的都要记载下来……暴露旧的东西，使后人知道老根子，这样就不会割断历史。周恩来

合订本 第十卷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总第
31—
32
辑

文史资料选辑

（第10卷）

合订本 第十卷

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

开明旧事/003

——我所知道的开明书店

◎ 宋云彬

留英记/022

◎ 费孝通

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/044

◎ 潘光旦

北京师范大学校史拾穗/071

◎ 林砺儒

沪江大学始末简记/078

◎ 刘王立明

记北平新学联/088

◎ 中大荣

解放前的北京香山慈幼院/100

◎ 关瑞梧

新华信托储蓄银行沿革/108

◎ 朱锡祚

从成都商业银行看解放前金融业的畸形异象/122

◎ 米庆云

大成纺织染公司与刘国钧/137

◎ 朱希武

国货售品所始末/145

◎ 纪 华

康有为晚年讲学及其逝世之经过/155

◎ 任启圣

康南海史料商榷/162

◎ 王益知

记北京饭店/170

◎ 邵宝元

北京电车公司见闻回忆/174

◎ 刘一峰

质疑·补充·订正

阅读《文史资料选辑》的管见（校订和补充）/191

◎ 徐一士

关于《中村事件真相》的补充/196

◎ 谷振寰

关于章嘉代表少数民族的问题/197

◎ 郭清德

对《虞洽卿的一生》的补正/198

◎ 赵晋卿

对《选辑》第十七辑、二十辑中三文的一点补正/200

◎ 范予遂

有关黄百韬史料的补正/201

◎ 岳星明

对《解放前夕我和胡宗南策划的一个阴谋》的两点订正/202

◎ 张宣武

有关段英被杀的一点史实/203

◎ 永莲香

关于“广德、泗安的防御战”的再加订正和补充/203

◎ 张宣武

萧忠贞不是改组派北平负责人/206

◎ 萧 训

对《选辑》第二十四辑三篇的补充和订正/207

◎ 黎照寰

对《追随孙中山北伐回忆录》的订正和补充/209

◎ 任启圣

对《护法军政府海军始末》的几点意见/210

◎ 陈文会

关于周学熙、杨味云和华新纱厂资料的补充/212

◎ 夏少泉

对《选辑》第二十四辑的四点补正/213

◎ 李文杰

对《张静江事迹片断》的订正/214

◎ 许炳堃

“中央农业实验所”创立的经过/215

◎ 邹秉文

对《万木草堂回忆》的质疑/216

◎ 李文杰

蒋介石在京沪杭最后的挣扎/219

◎ 侯镜如 覃异之 廖运泽

江阴要塞解放的片断/238

◎ 梅含章

蒋军长江败退和淞沪溃逃的狼狈情形/243

◎ 施有仁

蒋军五十一军上海被歼记/250

◎ 金 钺

国民党统帅部关于京沪杭作战的决策和争吵/256

◎ 唐 文

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劫掠和大屠杀/259

◎ 郭 旭

1949年国共和谈的有关史料/264

◎ 张丰胄

1949年北平和谈的片断/281

◎ 刘 斐

和谈前夕蒋介石的幕后操纵和李宗仁的备战部署/290

◎ 宋希濂

蒋介石准备暗杀李宗仁的阴谋/296

◎ 沈 醉

蒋介石下野后在福州召开军事会议前后/299

◎ 李以劭

蒋介石做总统的一个片断/319

◎ 胡次威

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琐记/324

◎ 王捷三

孙科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的形形色色/330

◎ 周一志

“中原王”汤恩伯/337

◎ 文 强

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内幕/359

◎ 沈 醉

附注：

对《“中原王”汤恩伯》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《选辑》第43辑。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

编

文史资料选辑

第三十一辑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开明旧事

——我所知道的开明书店

◎ 宋云彬

一 前 言

解放以前，全国有六家大书店，就是商务印书馆、中华书局、世界书局、大东书局、开明书店和国民党官办的正中书局。^①解放以后，正中书局当然不存在了，世界、大东也相继停业，开明书店于1953年跟青年出版社合并为中国青年出版社。

讲到开明书店，它的资本最多的时候也不过30万元，远比不上商务、中华，出版物的数量也不多。但是，由于它的服务对象明确，对出版物质量的重视，更由于在政治上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所利用，始终坚持中间偏左的立场，所以它在当时被公认为是一家比较进步的书店，在六家大书店当中，一般人都把它跟商务、中华看作鼎足而三的。固然，讲到进步性，开明又远比不上生活书店，但生活书店的性质究竟跟开明有所不同，不必强拉在一起作比较。

商务创立于戊戌政变前后，中华创立于辛亥革命时期，而开明则创立

^① 这六家书店，其中五家是民营的，它们都出教科书，平时为了推销教科书，互相倾轧，互相排挤，竞争得很厉害。等到国民党官办的正中书局正式开张，它也出教科书，有官方做后盾，五家民营书店都怕它倚仗政治势力，在推销教科书方面，会不择手段地乱搞起来。世界书局经理陆高谊提出建议，自己内部先实行休战，团结起来，然后把正中也拉进来，六家书店形成一个集团，合理解决分配销行教科书的问题。商务的王云五和中华的陆费伯鸿都赞成。由陆费伯鸿出面，邀商务、世界、大东、开明和正中的负责人，到南京汤山开了一个会。从此这六家书店形成一个集团。六大书店这个称号就是这样来的。这个集团的形成，起初原是五家民营书店借此来束缚官方的正中书局，但实际上却形成了书业托拉斯，从此这个集团以外的别家书店，就休想出版教科书。例如北新书局也是出了几种教科书的，只因陆费伯鸿他们不把它放在眼里，没有邀它参加这个集团，后来北新出版的教科书，销数就微不足道了。



于五四运动以后，各有它的历史背景。尤其是开明的产生，完全受五四运动的影响。没有五四运动就不会有人提出妇女问题来讨论，那么开明书店的创办人章锡琛先生，就不会因为谈新性道德和办《新女性》杂志而被商务印书馆解职，他将一辈子在商务当个编辑；而同时在五四以前，像开明这样的新型书店根本办不起来，即使办起来了，也不可能发展，更不可能长期存在。现在开明早已跟青年出版社合并，“开明书店”这块牌子不存在了，应该有人它的历史记下来。我只能写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，不够全面，聊供参考而已。

二 从《编者附白》说起

鲁迅《集外集拾遗》中有一篇题目叫《编者附白》的短文：《莽原》所要讨论的，其实并不重在这一类问题。前面登那两篇文章的缘故，倒在无处可登，所以偏要给他登出。但因此又不得不登了相关的陈先生的信，作一个结束。这回两篇，是作者见了“《现代评论》的答复，而未见《莽原》的短信的时候所做的，从上海寄到北京，却又在陈先生的信已经发表之后了，但其实还是未结束前的话。因此，我要请章、周二先生原谅：我便于词句间换了几字，并且将《附白》除去了。大概二位看到短信之后，便不至于以为我太专断了罢。”《鲁迅全集》的编者又加了个注释：“本篇发表于1925年6月5日《莽原》周刊第七期章锡琛《与陈百年教授谈梦》和周建人《再答陈百年教授》两文之后。”

骤然读了这篇短文章，谁也不明白究竟是什么一回事，更谁也不会想到这跟后来开明书店的创立有关系。《鲁迅全集》编者所加的注释，也没有说明问题，现在我给它疏证一下。

五四运动以后，商务出版的几种期刊如《东方杂志》、《小说月报》、《妇女杂志》等，都不能不革新内容，以迎合潮流。《妇女杂志》是由章锡琛主编的，特别在1925年1月出了一期《新性道德号》，载有章锡琛写的《新性道德是什么》和周建人写的《性道德的科学标准》。他们认为无论男子或女子，都不妨一个人同时跟两个人以上谈恋爱，只要“本人的意志如此而不损害他人时，决不发生道德问题”。这种议论，现在看起来，原不过是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一些陈腔滥调。章锡琛先生也说：他们是从罗素的《社会改造原理》、《到自由之路》，加本特的《爱的成年》和爱理斯的《性的心理研究》等书里“烧直”来的。可是那时候的新旧卫道者们，却把这种议论看作洪水猛兽，群起而攻。首先是《晶报》，说他们教坏了青年，接着是《时事新报》的报屁股《青光》，说他们提倡男子多妻，女子多夫。《晶报》和《青光》的攻击，不起什么

作用，因为《晶报》是一批“黑幕派”搞的充满低级趣味的小报，本来不被人重视，而报屁股上的文章也是无足轻重的。可是不久陈大齐也在《现代评论》（第十四期）上发表文章，题目叫《一夫多妻的新护符》，硬说他们提倡一夫多妻。陈在当时是个名教授，为胡适等所吹捧，又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过文章。他一站出来说话，影响就大了，使得章、周两位不得不写文章答复。可是文章寄给《现代评论》，《现代评论》却给它压起来不发表，写信去问也不答复，他们只好把文章抄寄给鲁迅先生主编的《莽原》，很快就登出来了。后来《现代评论》（第二十二期）也把章、周两位的文章发表了，不过是登在通讯栏里的，同时还登了陈大齐的复信。章锡琛又写了一篇《与陈教授谈梦》，周建人写了一篇《再答陈百年先生论一夫多妻》，在《莽原》第七期上发表。

这样一疏证，大家可以明白《编者附白》里讲的是怎么回事了。

三 《新女性》的刊行和章锡琛的被商务解职

那时候，商务的总编辑是王云五。王云五为了讨好《现代评论》派，1925年8月，把章锡琛调到国文部当编辑。从9月份起，另由杜就田主编《妇女杂志》，《妇女杂志》就一变其原来面貌，专门谈些怎么样给孩子喂奶和怎么样做鸡蛋糕等等，因此销数一落千丈。锡琛的同事郑振铎、胡愈之等都为他抱不平，怂恿他另编一种月刊。经大家商定，取名《新女性》，用新女性杂志社名义发行，由锡琛的朋友吴觉农出面当主编和发行人，发行地址就在上海宝山路三德里吴觉农的家里。王云五恼羞成怒，就在这年年底，送一封辞退信给锡琛，请他“另行高就”。

商务辞退职工，照例给一笔退俸金。锡琛服务14年，有一两千元退俸金可以拿。振铎又介绍他在神州女子中学教几点钟课，他每月有了一定的收入，就拿这笔退俸金作本钱，用妇女问题研究会名义，编印妇女问题研究会丛书，如《妇女问题十讲》、《新性道德讨论集》之类。振铎又把文学研究会的《文学周刊》和文学周刊社丛书交给他们刊行。书愈出愈多，销路也好，可是几千元的资本感到不足了，锡琛就向他的胞弟锡珊讨救兵。锡珊原在沈阳商务印书馆分馆当会计。他这个人勤俭朴素，积蓄了一点钱，又富于事业性。锡琛向他借钱，他感到自己依人篱下，不是久长之计，就决定辞了职同他老兄合办一家兄弟书店。他在回上海以前，荐了一位叫孙怡生的来管发行事务。1926年8月间，就在上海宝山路宝山里60号挂起一块“开明书店”的牌子来了。



四 从兄弟书店到股份有限公司

那时候的开明，既然是一家兄弟书店，资本少，不过四五千元；工作人员也少，一共不过四五个人。除了章锡琛兄弟而外，担任编校等工作的有赵景深、钱君匋、王蔼史（女）和索非等。钱君匋是个美术家，每种书的封面都由他设计，因此开明出版的书有一种独特风格。后来别家书店也渐渐注意到封面设计，但开明确是开风气之先的。索非是个无政府主义者，思想不健康，但年轻力壮，干劲十足。他除了看稿、校稿，还要跑印刷厂，有时候还帮助做饭。开明的业务发展很快，不到一年光景，60号这一幢兼作住宅、宿舍、编辑所、发行所的房子，已经不够展布了，又租了隔壁64号的房子。编校方面也添了人，如王燕棠、汪曼之（女）和陈云裳（女）（她后来改名陈英，解放后在科学院工作过）等。出书的方向也渐渐有所改变，关于妇女问题的书少出了，文学书和青少年读物增多了，还出版了几种属于数、理、化方面的中学教科书。此外丰子恺、钱君匋等搞的不少种歌谱，在靡靡之音普遍流行的当时，起了整风作用。而章锡琛设计的《活叶文选》受到学校教师和广大读者的欢迎（后面还要详细讲）。《新女性》杂志后来就停刊了。立达学会同人夏丏尊、刘叔琴、方光焘、刘熏宇等编辑的定期刊物《一般》由开明出版。

1928年，由夏丏尊、刘叔琴、杜海生、丰子恺、胡仲持、吴仲盐等发起，改组为有限公司，资本5万元。1929年，公司正式成立。1930年增资5万元，1931年增资10万元，1933年增资5万元，1936年又增5万元，共计股本30万元。经理先是杜海生，章锡琛自任协理。发行所先从宝山路搬到望平街，又从望平街搬到福州路，跟中华书局对面，俨然一家大书店了。

编译所也搬过几次场，先从宝山路搬到兆丰路，再从兆丰路搬到梧州路，租了一家丝厂的大厂房，前面做编译所、总办事处和货房，后面是美成印刷厂。^①编译所长是夏丏尊。主持编辑工作的有叶圣陶、王伯祥等。那时候，开明已经确定以出版中学教科书^②和中学生课外读物为主要方针（直到全国解放，这个方针始终保持，没有什么改变）。夏、叶两位先生

① 开明自己没有印刷厂。美成印刷厂是由章锡琛的小舅子吴仲盐发起的，也是股份有限公司，仲盐是大股东兼经理。这家印刷厂事实上就是开明的印刷厂，专门排开明的出版物，不接别家出版社的印件。只有一次是例外，那就是排瞿秋白同志的遗著《海上述林》，打成纸型，由鲁迅先生托人带到日本去印刷装订。鲁迅先生为了这桩事情，亲自到美成去过几次。抗日战争起来，美成全厂被毁，仲盐的家产也搞光了，回到乡里，郁郁不乐，就在抗战时期生肺病死了。

② 开明为了提高它在教科书竞销市场中的地位，于1932年出版过几种小学教科书，其中语文课本，叶圣陶写课文，丰子恺画插图，可称双绝。可惜小学教科书一向被商务、中华、世界垄断着，开明无法跟它们竞销，后来只好不印了。

在青年读者当中有极高的威信，他们自己编写的几种指导青年语文学习的书，给青年们的帮助很大。圣陶是个文学家，也是个很好的编辑工作者。他的那种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，给开明同人做出了好的榜样。

初期的开明书店，机构小，工作人员不多，都是一些趣味相投的朋友，没有什么规章制度，也没有严格的分工，完全是手工业作风，里面充满一种温暖的气氛，自然而然地提高了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事业兴趣性，不斤斤计较工作时间和报酬。刚改组成为有限公司的时候，还保持着这种作风，但不久情况就改变了。大约从1933年起，开明开始拟订各种规章制度，陆续公布。这些规章制度，大部分是从商务那里抄来的，多数由丁晓先草拟，经会议通过。婢学夫人，学得个四不像。那时候总公司一共只有100多个工作人员，组织系统却分为三个处所，一个室，18个部，33个课和四个委员会。职工每天上下午签到，旷工照扣薪水。还有其他各种章则。这样一来，过去的那种温暖气氛，给一扫而光了。那时候，我已经进开明，我跟锡琛谈过，我说这样做有利也有弊，其弊在容易挫伤同事们的积极性。但锡琛他们的看法跟我不同，据说这样做完全合乎资本主义发展规律云云。本来呢，为了严密内部组织，搞好分工合作，定一些规章制度，也是需要的。但必须结合实际情况，顾到开明的特点，考虑到如何保持那种优良传统，如何发扬同事们的工作积极性。然而锡琛他们全不考虑到这些，一味看商务、中华的样。锡琛也没有想到像叶圣陶为什么要从商务跑出来，做开明的编辑。当时开明的大多数同事，对锡琛他们这种搞法是有反感的。不久，圣陶就在他的故乡苏州盖了几间房子，全家搬了回去。他虽然没有脱离开明，但不是天天上班，一个月只来上海一两次了。

随着业务的开展，机构的扩大，各地分店的增设和人员的添加，也给开明带来了一些困难。首先是经济上的困难。大概也是一种规律吧，出书愈多，营业愈发展，愈加感到钱不够。开明没有自己的印刷厂，不能用机器向银行押款。调度款子原是经理杜海生的责任，但后来杜海生辞职了，由章锡琛当了经理。锡琛原是搞编辑的，跟金融界不曾打过交道，因此又请了一位范洗人当协理。范虽然有办法调点款子，但是不多。所以当时开明表面虽然生意兴隆，内部却在天天过年卅夜。再加当时应付国民党反动派，更是一种棘手的事情。开明先后出版了好几十种中学教科书，这些教科书必须经当时的教育部审定，才得发行，那就不得不跟南京的官方虚与委蛇。开明出版的文学书，如茅盾、巴金和其他进步作家的创作，以及翻译的高尔基的作品等等，在国民党反动派看来，都是非常讨厌的，总要用种种方法来刁难。茅盾的《子夜》就受到过刁难，以致不得不在第二版作了一些删节。还有两种定期刊物，《中学生》和《新少年》，常常要受到所谓“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”的刁难。因此，当经理的人又不能不跟上海



的官方虚与委蛇。这些应付极不容易，自己必须有一条界线，突破了这条界线，那就无异向国民党反动派投降。我记得有两桩事情，开明应付得相当好。一桩是沈端先（即夏衍）译的高尔基的《母亲》被禁售，他们把“孙充瑞”改为“沈端先”，《母亲》改为《母》，仍然继续印行。一桩是郭老（郭沫若）的《离骚今译》，里面有“党人之偷乐”一句，审查老爷认为是暗骂国民党，不给通过。章锡琛就质问他们：“是不是战国时代已经有了国民党？”问得他们哑口无言，只好通过（但出版以后，他们还是在暗中查禁）。

而不久，抗日战争爆发了。

五 抗战时期和解放前后的开明书店

抗日战争爆发，开明总厂被毁，资产损失达全部资产的80%以上。

开明的两位主要负责人章锡琛和夏丏尊，有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不关心时事。因为不关心，对时局就不能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。丏尊不相信会出现长期抗战的局面。他不止一次地跟我说过：“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，没有认真跟帝国主义者打过一次仗，目前这个坏政府，更不会真正跟日本打起来。”（我觉得夏先生这句话只说对一半。他看透了蒋介石不会真正抗战，却没有看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，全国人民同仇敌忾，坚决要求对日抗战，蒋介石为形势所迫，不敢公开降敌，就有打起来的可能）锡琛呢，他虽然不是绝对不相信会打起来，但他把租界看作安全地带，以为梧州路是租界，即使打起来，也不会在租界中作战。他还有一种奇怪想法，认为国家到了最危险的关头，我这点小小事业算得什么。有一次我问他开明作了什么准备的时候，他就是这样回答我的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如果章、夏两位警觉性高一点，看得远一点，事先作了相应的布置，开明的资产损失不会到80%以上。

8月10日，南京的“教育部”召集上海各书店经理到南京去开会，宣布战争不可避免，要各家赶快把机器和各种重要物资搬离上海，说政府已经在武昌安排设厂地点，还拨定了运输船只，叫各人回去立刻动手搬。他们都信以为真。章锡琛第二天回到上海，就准备搬动。但那时候上海所有企业和居民都忙着搬场，运输车辆非常缺乏。开明自己没有一部汽车，靠临时雇大车搬货，一天搬不了多少，拆卸机器更加无法，只得听天由命了。可怜美成印刷厂的大股东吴仲盐，他的全部家产差不多全搁在这个厂里了，他哭丧着脸对我说：“机器搬不动，要搬也得花上万把块钱，美成没有这笔现款，只好听天由命。炮声一响，我准备坐在机器旁边，跟机器共生死！”